



浙西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

诸葛蓉

浙西南,这个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基础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形成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并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浙西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1926年冬,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浙西南发展党员,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浙西南多次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0年春,党中央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浙西南红军约2000余人编入了红十三军,还有20多处数千人的地方红军游击队、农军呼应第十三军斗争。浙西南成为红十三军的策源地之一和重要活动地区。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始于1934年8月下旬,是由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始的。1934年6月,面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节节失利的严峻形势,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抽调部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先遣队的任务之第一条是“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同年8月下旬,先遣队奉命从福建转战到浙西南的庆元、龙泉等县。9月上旬,先遣队主力离开浙西南去闽北,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令,留下第五十五团第二营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区继续开展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1月,先遣队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的怀玉山地区遭受重创。2月,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命令先遣队的余部组成挺进师,任务是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下,去浙西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并且将部队取番号由闽浙赣省军区浙西南独立师,又称红军挺进师。3月,挺进师从赣东北挺进到闽北。原先遣队第五十五团第二营归属挺进师,于5月上旬,被派回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区“老基地”,继续开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月,挺进师在松阳等地受到当地农民热烈欢迎和支持帮助,一起开展了全面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6月,在松阳小吉会议上,第一次建立了领导全地区党的工作的党组织——中共浙西南特委,同时建立了浙西南军分区。七八月间,以松阳、龙泉、遂昌、江山、浦城数县边境地区为中心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成功。根据地内普遍建立起政、军、群各条各级组织,并且开展了土地革命。贫苦农民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场景。在部分地区,农民分得了土地证。世世代代受苦受压迫的工农大众真正翻身作了主人。红军挺进师由初进浙西南时的500余人发展到1000余人,地方红军游击队发展到1000余人,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干部1000余人。中国工农红军在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正像粟裕所说的,这时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低潮时的一个局部高潮”。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由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及其余部挺进师,汇合浙西南当地革命力量创建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浙西南党组织与人民为创建和保存这个战略支点,英勇斗争,百折不挠,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一直坚持到1949年5月浙西南全境解放。蒋介石鉴于国民党浙、闽两省保安团队已经对付不了红军挺进师,急调正在“清剿”闽赣红军部队的其嫡系部队国民党十八军,连同浙、闽两省部队和地方武装合计40个团共7万余人,于1935年9月19日开始“围剿”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刘英、粟裕率一部突围,并于10月与闽东党的负责人叶飞共同建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在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下,挺进师于1936年4月和秋天,分别重新开辟了浙南、浙东南游击根据地。被派遭到浙西南东北部的挺进师一部,与红十三军余部一起,共同开展巩固扩大浙东游击根据地斗争。而留在浙西南坚持斗争的一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受到很大损失,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丧失。但浙西南斗争并没

有因此结束,留在浙西南坚持斗争的红军,在临时省委领导下,在粟裕率部重返浙西南后的直接带领下,粉碎了1935年9月下旬至1936年5月和1937年1月至1937年8月国民党的两次重兵“围剿”,恢复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保住了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保住了浙西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

从1940年刘英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浙西南是他提得最多的地区,是挺进师战斗主要区域,并且得到中共中央东南局的充分肯定:“在坚持浙西南三年斗争中,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组织,表明自己的先进和能够随机应变以及独当一面的艰苦奋斗精神。它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了数十县的民众,扩大了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保存了自己的生存力量,在某些地区分配了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创立了成为今天抗战的主要支点之一。”

浙西南——这个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不久,闽浙边临时省委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协议。1938年3月,粟裕率挺进师主力编入新四军,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刘英率领少数老红军干部仍留在浙江坚持斗争。1937年12月,闽浙边临时省委以坚持浙西南斗争的老红军为主体,恢复重建中共浙西南特委,领导浙西南人民投入抗日救亡的新斗争。与此同时,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将外地党员组建为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进入丽水,通过统战工作关系,输送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各县国民党政府机构工作,以公开合法身份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5月,闽浙边临时省委与省临工委同时撤销,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浙西南临时省委成立。同月,中共浙西南特委改为中共直属特委,撤销中共浙南特别工委,所属组织划归直属特委领导。丽水全区党的组织实行统一领导。自1937年底至1939年夏,浙西南党组织积极创建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在此期间,1938年3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丽水城设立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大批党员、进步青年和抗战物资,从上海、温州通过丽水,输送到皖南,以支援新四军抗战。1939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机关从温州迁移到丽水城,在丽水领导全省党的工作。4月,周恩来来到丽水视察抗战,有力地推动了丽水的抗日救亡运动,浙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省委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拨送的电台,架设在龙泉老区,由直属特委具体负责保护和传达电文。东南分局在丽水设有专职政治交通员,负责与浙江省委的联络。浙西南成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的一个重要工作地区和可靠的联络地区。浙西南党组织同时得到很大发展,党员数量从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时期的1200余人发展到1939年底的4500人。浙西南逐渐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顽固派对于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抗日中取得的工作成绩和组织发展壮大极端仇恨,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掀起第一次反共逆流,撤销许多抗日机构,致使大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被迫撤离,浙西南形势逆转。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逆流,浙西南党组织的部分工作地区遭受军事进攻,一些地方党组织被破坏。尤其是1942年连续发生的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机关被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牺牲,浙西南党组织多位重要负责人相继牺牲,日军人侵丽水等突发事件,使浙西南党组织又处于十分困难的工作境地。但是浙西南党组织顽强坚持斗争,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东南分局的“隐蔽精干”指示,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动党员以群众面目出现,自筹资金,制造枪支,准备抗击日军侵略;在整顿巩固基层党组织基础上,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浙西南党员总数从1940年的4500人发展到7000人。

浙西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在解放时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解放战争爆发后,浙西南党组织逐渐从隐蔽精干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1947年,浙西南党组织与浙东党组织在没有省委情况下,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以浙西南武装为主体的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14个县,扩大了共产党影响。这是1947年浙江党史上的一件大事。1948年,浙西南革命武装主动出击,拔除国民党区乡反动据点和政权机构,逐步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此时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成为与浙南、浙东一样重要的浙江三大游击根据地之一。到1949年4月,浙西南地区党员总数从抗日战争胜利时的7000人扩大到12000人。其中仅在浙西南境内中共直属特委工作地区已建立起三个游击支队,正规脱产的革命武装发展到1000余人,民兵上万人,其中呼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基干民兵三四千人。建立党的组织为特委1个,县委4个。广大农村大部被共产党游击队控制,松阳、景宁两县被地方游击队解放。1949年5月上旬,浙西南革命武装配合南下解放大军,解放了包括丽水老处州府城在内的浙西南境内其他8个县和台州地区仙居县西部。浙西南人民经过23年坚持不断、百折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

浙西南属于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地区,蒋介石统治集团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尤为严密,从上到下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庞大的特务系统,在农村普遍建立了保甲组织和地方反动保卫团。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封建反动组织。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其环境之险恶,斗争之艰苦,较其他许多地区更甚,而党和人民为争取斗争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更大。

浙西南党组织在23年的革命斗争中,屡遭国民党武装的“围剿”“清剿”,规模最大的有五次。

第一次,1930年冬,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团队勾结地方反动保卫团,残酷地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和红军、农军指战员。革命遭到失败。

第二次,1935年8月,蒋介石建立以卫立煌、罗卓英为正副总指挥的“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调遣正在江西“剿共”的嫡系部队,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和江西、福建、浙江等武装40个团7万兵力,于9月19日开始“围剿”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长达8个月的血腥镇压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丧失。但浙西南的革命斗争转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第三次,1937年1月至1937年8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在国共会谈之前消灭我南方游击区的红军,采取“北抚南剿”的方针,调集刘建绪第四路军和各地地方保安团等共约10万余兵力,对闽浙赣皖四省边区的红军进行了残酷的“围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又是这次“围剿”的重点地区之一。在长达8个月的“围剿”和反“围剿”中,浙西南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以及游击根据地又顽强地保存下来。

第四次,1940年冬至1944年春,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浙西南党组织已转入隐蔽精干斗争。国民党顽固派调集部队,反复、持续不断地对浙西南部分基本地区进行“清剿”,并利用叛徒、特务组织“肃奸队”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浙西南部分基本地区党组织再次遭受损失。



主体的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14个县,扩大了共产党影响。这是1947年浙江党史上的一件大事。1948年,浙西南革命武装主动出击,拔除国民党区乡反动据点和政权机构,逐步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此时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成为与浙南、浙东一样重要的浙江三大游击根据地之一。到1949年4月,浙西南地区党员总数从抗日战争胜利时的7000人扩大到12000人。其中仅在浙西南境内中共直属特委工作地区已建立起三个游击支队,正规脱产的革命武装发展到1000余人,民兵上万人,其中呼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基干民兵三四千人。建立党的组织为特委1个,县委4个。广大农村大部被共产党游击队控制,松阳、景宁两县被地方游击队解放。1949年5月上旬,浙西南革命武装配合南下解放大军,解放了包括丽水老处州府城在内的浙西南境内其他8个县和台州地区仙居县西部。浙西南人民经过23年坚持不断、百折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

浙西南,这个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得到保持和巩固,其重要原因是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是浙西南党组织能够根据上级指示,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斗争;是广大党员、干部和老区群众,不顾困难和危险,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地投入革命斗争

浙西南毗邻闽赣两省和浙江的温、衢、金、台四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党中央十分关心和重视这一地区的斗争。早在1934年8月下旬,党中央、中革军委就命令先遣队转战到浙西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先遣队主力离开后,又命令留下部队继续开辟浙西南。1935年2月,中央苏区分局书记项英命令中共闽浙赣省委将先遣队余部编成闽浙赣省军区浙西南独立师(挺进师)进入浙西南长期行动,继续创建革命根据地,打击、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军,使浙西南与闽北、闽东老区形成三足鼎立态势,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与毗邻游击区域,在战略上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一再强调南方游击根据地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根据党中央指示,刘英带领一批挺进师老红军留在浙江。其中张麒麟、傅振军、宣恩金、曹景垣这些浙西南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挺进师老红军干部。他们在浙西南坚持斗争14年,直到解放。其中,1939年3月至1941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机关从温州迁移到丽水,在丽水领导全省党的工作两年零1个月。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浙江省委领导机关要迁移到山区去,不要留在城市里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委决定将省委机关迁移到浙西南的龙泉、浦城边境。省委书记刘英亲自叮嘱浙西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傅振军,要做好接应省委机关迁移到浙西南老区的相关工作。1942年2月发生温州事件,省委机关遭破坏,刘英被捕,省委机关再迁移到浙西南老区的计划未能实现。为了继续坚持和发展浙西南地区的斗争,浙西南党组织从多渠道设法获得党中央和华中局指示,以指导工作。1942年四五月间,中共浙南特委领导机关从瑞安迁移到浙西南境内的景宁梅岐山区。浙西南党组织的负责人与浙南党组织的负责人互相联络,交流工作情况,共同学习领会党中央、华中局关于加强隐蔽和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有关指示。1944年春到1945年秋,浙西南党组织与中共浙东区委密切联系。浙东区委党委书记谭启龙明确指出:浙东区委党委与浙西南党组织不是直属关系,浙西南党组织与浙南党组织是两个地区之间的兄弟关系,

处属特委是刘英书记牺牲前建立的,由省委直接领导。1946年春,浙东新四军北撤后留下的浙东党组织仍然通知浙西南党组织派人去浙东看阅党中央和华中局文件。1947年夏,浙西南、浙东两地党组织负责人在浙西南境内召开联席会议。在此前后,浙西南党组织与浙南党组织,与活动于浙闽边境的福建省党组织同时建立联系,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蒋管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全国开展解放战争的指示,进行共同探讨和配合行动。所有这些,都说明浙西南的革命斗争,其意义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浙西南一个地区,而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起着中国革命在南方一个战略支点的作用。而这个战略支点能够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建立起来,又能够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中央、上级党组织的关怀和正确领导。

浙西南党组织能够根据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指示,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斗争,这也是浙西南这个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能够创建起来,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1940年4月至1947年7月,在这7年时间里,为了进行隐蔽精干的斗争,浙西南党组织除坚持武装自卫,还制订了一系列适合浙西南特点的政策和策略。其中,在对待国民党基层政权的问题上,普遍建立并推广“白皮红心”,以掩护党的工作。所谓“白皮红心”,就是争取、团结国民党乡保人员和开明绅士,或派党员通过竞选打入乡保政权。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权形式,在敌强我弱的国民党统治区,起到了公开的红色政权无法起到的作用。这也是浙西南长期赖以隐蔽、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浙西南党组织还特别重视秘密交通联络点的建立。各地党的脱产干部大多是隐蔽在地方党员家里,以后队伍扩大了就选择那些党支部较坚强、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村庄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武装部队集体住宿、修整、学习的堡垒村、交通联络点。浙西南的广大党员、干部和老区群众,不顾困难和危险,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地投入革命斗争,也是浙西南地区这个南方革命的战略支点能够坚持漫长艰苦的斗争岁月的重要原因。松(阳)遂(昌)龙(泉)农民首领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引领群众高呼“青红一句话,永生不分家”,热烈欢迎红军。当地群众为红军站岗放哨,送信带路,购买药品,安置伤病员等;红军与敌军作战时,群众烧水做饭送到火线。浙西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极其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血肉相连,甘苦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正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所以红军挺进师能在浙西南立足,并很快打开斗争局面,最终取得斗争的胜利。

浙西南党组织和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在浙西南的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浙西南党组织长期的光荣斗争历史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上级党组织曾给予很高的评价。1949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在给中共直属特委的指示电中,称赞浙西南党组织在艰苦环境中长期坚持独立斗争,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这是浙西南党组织和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作者系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

欢迎刊登《丽水日报》广告

联系电话: 0578-2117788 2128242 2121176(传真)

地址: 丽水市中山街北126号



值班副总编辑	施龙有
夜班主任	洪盛勇
审读	陈良东 徐梓滔
夜班编辑	陈俊
二版校对	吴芬芬
夜班美编	王少剑
广告校对	蓝小花
电脑组版	
一版	徐晟
二版	李红
三、四版	李红伟



雷宁摄